

## 論《世說新語》的敘事規模 及其與「簡單形式」的關係

中興大學尤雅姿

### 壹、緒論

#### 一、《世說新語》的組織規模概說

《世說新語》已在人間流傳十五個世紀，這本書是由南朝劉宋時期的劉義慶所領銜編撰。劉義慶生於西元四〇三年，卒於西元四四四年。他是劉宋王室的重要成員，襲封臨川王，歷任豫州、荊州、江州、南兗州刺史等軍政首長，掌有豐厚之政經資源，再加上愛好文義，生性簡樸寡嗜欲，幕下僚屬又有文壇俊秀如袁淑、陸展、何長瑜、鮑照等才士，因而具備有編撰巨著的優勢資源。《世說新語》的成書條件應當就在這種主客觀因素都趨成熟的情況下，由劉義慶為主腦，領導旗下的文藝才俊所共同策劃編纂而成。他們廣搜漢魏兩晉至宋之間的遺聞軼事，參酌當代的文獻典籍，結合歷史和文學的敘事謀略，書寫關於這段史程的文化記憶。

《世說新語》全書約十萬言，分三十六門類繫屬，總計一千一百三十則<sup>1</sup>。上卷之〈德行〉計四十七則、〈言語〉計一百零八則、〈政事〉計二十六則、〈文學〉計一百零四則，以上四篇共計二百八十五則，佔全書之百分之二十五。中卷之〈方正〉計六十六則、〈雅量〉計四十二則、〈識鑒〉計二十八則、〈賞譽〉計一百五十六則、〈品藻〉計八十八則、〈規箴〉計二十七則、〈捷悟〉計七則、〈夙惠〉計七則、〈豪爽〉計十三則，以上九篇共計四百三十四則，佔全書之百分之三十八。下卷之〈容止〉計三十九則、〈自新〉計兩則、〈企羨〉計六則、〈傷逝〉計十九則、〈棲逸〉計十七則、〈賢媛〉計三十二則、〈術解〉計十一則、〈巧藝〉計十四則、〈寵禮〉計六則、〈任誕〉計五十四則、〈簡傲〉計十七則、〈排調〉計六十五則、〈輕詆〉計三十三則、〈假譎〉計十四則、〈黜免〉計九則、〈儉嗇〉計九則、〈汰侈〉計十二則、〈忿狷〉計八則、〈讒險〉計九則、〈尤悔〉計十七則、〈紕漏〉計八則、〈惑溺〉計七則、〈仇隙〉計八則，以上二十三篇共計四百一十一則，佔全書百分之三十六。各篇所收錄的資料豐儉不一，其中最為可觀的有〈言語〉、〈文學〉、〈方正〉、〈賞譽〉、〈品藻〉、〈任誕〉和〈排調〉等六篇，約可看出當時士人文化之多元性價值觀。至於內容較少的篇目是〈自新〉、〈企羨〉、〈寵禮〉、〈讒險〉、〈惑溺〉等，其中原因可能是搜集不易，認定困難，或是資料未及補足就殺青出書之故。

全書的敘事筆法簡約精粹，字數在五十字以下的有六百五十四則，佔全書的百分之五十八；字數介於五十一字和百字之間的有三百六十七則，佔全書的百分之三十二；易

<sup>1</sup>據余嘉錫撰：《世說新語箋疏》（台北：華正書局，1984年）一書統計得出。

言之，全書有九成篇幅是以一百字的簡潔形式完成的敘事。其餘不到一成的敘事雖超過百字，但也未曾多於三百字。與其簡省字數相對的是《世說新語》所載的人物數目極為眾多，假使連同劉孝標注文所涉及的人物計算在內，總計超過一千五百人；要是只統計《世說新語》本文中出現的人物，也有六百七十四人之多；即使以至少出現二次的人物來計算，《世說新語》中的常見人物亦達二百一十七人<sup>2</sup>。至於書中所涵蓋的時代更是長達六百年之久，最早的敘事首推〈賢媛〉第一則，這則記述秦末大亂，陳勝起兵，眾殺縣令，東陽人欲擁立陳嬰為主，其母諫嬰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尚可稍蒙其利；若不成，也好脫罪。此事亦載於《史記·項羽本紀》，約於西元前二〇九年發生。《世說新語》最晚的一則敘事應是〈言語〉第一百〇八則：記載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淳之質疑他何以希心高遠，卻不能擺脫「曲蓋之貌」；謝靈運答以：「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根據史籍所載，謝靈運係於宋文帝元嘉十年棄市於廣州，該年為西元四三三年。他應當是《世說新語》所載最晚的人物。故知本書的敘事時間跨度，前後長達六百餘年之久。

面對六、七百人如此浩繁的人物、六百餘年如此漫長的時間，以及一千一百三十則如此豐富的雋言逸行資料；劉義慶及其編輯群絕對需要宏觀周到的結構策略、微觀靈巧的敘事肌理，才能妥善將如此豐贍的遺聞逸事「繩之以法」：不論是篇目的羅列配置、人物言行的分類選擇、書寫技巧的研發與操作、節奏序列的緩急疏密、言意之間的擒縱筆法等，無一不需要全盤規劃、謀定而後動的敘事結構，否則千絲萬縷的人物事蹟，不是治絲益紛的糾纏混雜，就是破碎纖屑，漫無脈絡，令人難以卒讀。劉義慶在《世說新語》的體例安排和敘事方法上有卓越不凡的表現，因此為數眾多的中古軼事佳話，不但在綱舉目張，網絡通達的門類中各有所歸，而且雋永有味，令讀之者手不忍釋，歷代評述者每多稱揚，如宋人劉應登的序文：<sup>3</sup>

晉人樂曠多奇情，故其言語文章別是一色，《世說》可已。《說》為晉作，及于漢、魏者，其餘耳。雖典雅不如左氏《國語》馳騫，不如諸《國策》，而清微簡遠，居然玄勝。舉如衛虎渡江，安石教兒，機鋒似沈滑稽，又冷類入人夢思，有味有情，嚙之愈多，嚼之不見。蓋于時諸公割以一言半句為終身之目，未若後來人士俛焉下筆，始定名價。臨川善述，更自高簡有法。

其餘如宋人高似孫《緯略》說：「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晉以來往事佳話，為《世說新語》，極為精絕。」<sup>4</sup>明人胡應麟則評為：「讀其語言，晉人面目氣韻，恍然生動，而簡約玄澹，真致不窮，古今絕唱也。」<sup>5</sup>明人袁褱在序文中說：「嘗攷載記所述晉人話言：簡約玄澹，爾雅有韻。世言江左善清談，今閱《新語》，信乎其言之也。臨川撰為

<sup>2</sup>據徐震堦著：《世說新語校箋》所附「世說新語人名索引」之資料統計得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

<sup>3</sup>轉引自王能憲著：《世說新語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96。

<sup>4</sup>同注3，頁44。

<sup>5</sup>同注3，頁177-178。

此書，採掇綜敘，明暢不繁。」<sup>6</sup>晚近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也說：「《世說新語》今本凡三十八篇，自〈德行〉至〈仇隙〉，以類相從。事起後漢，止於東晉。記言則玄遠冷俊，記行則高簡瑰奇，下至繆惑，亦資一笑。」<sup>7</sup>

縱觀這些吉光片羽的評述，多能推崇劉義慶之編撰成就，肯定他結集有方，精絕高明的本事，故能樹立百代不絕的世說體敘事規模，可見《世說新語》的敘事結構是其文學成就的關鍵，有足深究的價值。然前人的評述每注重總體的審美感受和印象式的即興批評，在敘事肌理上的考察分析，以及在組織結構上的理論驗證等方面，猶有不少空間尙待耕耘，而西方卓有成就的敘事文學理論也饒具借鏡的價值，值得引渠灌溉沃潤之。總之，敘事結構原本即是世說研究中重要且生機蓬勃的一個體系，不論是從本源深求敘事構造體的初胚、或是情節的構造形式、敘述觀點的運用策略、敘事時間序列、空間序列的經營布置等等，都是理解《世說新語》如何實現其敘述意圖的必要途徑。因此，若要客觀翔實地分析《世說新語》的敘事意匠，則不能忽略上述有關敘事方面的研究範疇。近來亦有學者陸續發表相關的研究成果，如王能憲的《世說新語研究》專闢一章論其文學特徵，寧稼雨在《中國志人小說史》以「點的處理」、「網的彩成」、「空白的作用」說明《世說新語》的結構網絡，又以「合成的方法」、「對比的方法」概括其敘事技巧，梅家玲對其語言藝術有專著研究，學棣林秀寬曾以《世說新語》的敘事結構研究為碩士論文……等等，皆為《世說新語》的文學研究增色不少。

## 二、「簡單形式」與研究動機

本文擬探討的則是《世說新語》的「簡單形式」，「簡單形式」是所有文學形式的初胚，它是安德烈·喬勒斯（André Jolles，西元 1874—1946 年）提出的重要學說，普受學者廣泛援用。根據敘事理論家羅伯特·休斯（Robert Scholes）的評述：<sup>8</sup>

簡單形式就是以語言形式出現的一種人類思維的結構原則。……它們像語言一樣具有普遍性，並與人類用語言組織世界的過程密切相關。……一個「實現了的簡單形式」，就是諸如民間故事或其他具有一定美學水平的通俗或民間流傳的語言構造。這些簡單形式應與「文學」形式區別開來，後者是由單個人創作出來的審慎和獨特的語言產物。在人類歷史的最開始就存在著簡單形式，我們可以稱這種尚未被利用，但有著明確可能性的結構為「神話」或「笑話」或「謎語」等等。當一種文化創作了諸如一個具體的神話或笑話時，這些形式的可能性就變得具體化起來。作家們隨後就可以有意識地運用這些實現了的簡單形式去創作文學形式。其中的一些文學形式將組合許多簡單形式，並在這種組合過程中對它們進行相應的改造。……這些形式存在於人，即使用語言的人心靈之中，並作為其賦予

<sup>6</sup>同注 1，頁 931。

<sup>7</sup>魯迅著：《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 年），頁 67。

<sup>8</sup>（美）羅伯特·休斯（Robert Scholes）著、劉豫譯：《文學結構主義》（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5 年），頁 49-50。

世界以意義和價值的不同方式出現。它們是不可缺少的和無處不在的思維活動形式。每種形式都產生於喬勒斯稱為「思維傾向」的一種東西。這是一種特別的精神狀態。它被賦予具體的語言形式時，這種精神狀態的某些需求便導致了一個特殊形式結構的出現。

從休斯的論釋得知：簡單形式是一體兩面的的普遍結構，內面是思維傾向，外面是語言形式，兩者合為整體的簡單形式，它們經常出現於話語世界中的「諺語」、「謎語」、「笑話」、「傳說」、「故事」、「神話」、「英雄史詩」、「案例」等語言形式中，相當於我國所說的街談巷議、殘叢瑣語，或是「不佞麼，漁樵沒話說」的話柄、「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的談藪，「話說天下大勢」的話頭，以及笑話中的諧言渾語、談資笑柄等等。這些被賦予具體語言形式的「簡單形式」和作家完成後的「文學形式」有別，前者是原始的、普遍的、尚待完成的；後者是個別的、獨特的、編織組合過的，已成為一家之言的語言產物。

有三個原因促成本文以喬勒斯的簡單形式歸納《世說新語》的敘事初胚結構體。原因之一是我國傳統上對於小說素材來源及文體特徵的看法其實不異於喬勒斯。桓譚·〈新論〉說：「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sup>9</sup>班固《漢書·藝文志》認為：「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一言可採，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sup>10</sup>清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分小說流派為三：「其一敘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緝瑣語也。」在闡述雜錄類小說的範疇說：「紀雜事之書，小說與雜史最易相淆。諸家著錄，亦往往牽混。今以述朝政軍國者入雜史，其參以里巷雜談、詞章細故者則均隸此門。《世說新語》古俱著錄於小說，其明例矣。」<sup>11</sup>這些歷代重要的小說論點，雖然隻行片語，且其焦點和用詞也參差不一，但宏觀而言，它們已共同呈現了一些普遍的小說共識。以語言內容來說，是街談巷語、道聽塗說、里巷閑話、詞章細故……看似一鱗半爪，卻又無所不包，儼然涵容了人類所有與生活世界相關的記聞；從語言的形式構成而言，是叢殘小語，是短書，是小說，屬於文字數量少的組成結構；從文學創作的過程而言，是「合」叢殘小語、「出」於閭里小知、「綴」而不忘、「參」以里巷雜談，乃從還原的角度觀察小說各個組成部分的來源。因此，前賢的看法雖然尚未構成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但對於小說的結構描述，仍足以與「簡單形式」相呼應。

原因之二是《世說新語》全書的一千一百三十則情節構造形式，幾可視之為一千一百三十個「被實現了的簡單形式」，它們分別來自於士林之間流傳的語言構造，可能是口耳相傳，為人津津樂道的談資，也可能是已被文字書寫，體現於雜錄形式的舊聞軼事。這些被劉義慶網羅進來的語言形式雖然數以千計，但亦不外乎喬勒斯簡單形式中的九種範疇，當然，這其中有編輯群的結構意匠，有所偏重，有所改造，有所混合，類乎司馬

<sup>9</sup>〔梁〕蕭統撰：《文選》（台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頁453注文引。

<sup>10</sup>〔漢〕班固撰：《漢書》（台北：藝文印書館），頁899。

<sup>11</sup>〔清〕紀昀：《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

遷〈報任安書〉所云的成書原委：「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就《世說新語》來說，來自於簡單形式範疇的一千一百三十則清言雋行，被安置於編輯群構設出來的三十六篇網絡，以點、線、面、體的立體架構予以編織塑形，就是作家在簡單形式的基礎上所創作出來的獨特作品。

原因之三是《世說新語》有六百五十餘則以五十字之內的語言形式敘事，三百六十餘則以五十一字至百字之內的語言形式敘事，易言之，全書以百字之內敘事的共計一千餘則，這個數據既令人明瞭「小」說、「小」語、「短」書的結構特性，也不由得思考：如此普遍的短小形式是否反映出《世說新語》全面得自於「簡單形式」的文學現象？不唯如此，《世說新語》本身的語言產物，由於臥藏中國士人的思維傾向與語言藝術特性，因此也是後世作家普遍受到濡染的「簡單形式」，不論是入詩、入詞、入曲、入文、入戲劇、入繪畫，皆有跡可循<sup>12</sup>。後世千五百餘年採掇自《世說新語》而得的成語，更是為數可觀，如難兄難弟、期期艾艾、吳牛喘月、新亭對泣、無可無不可、雲興霞蔚、應接不暇、芝蘭玉樹、標新立異、竹頭木屑、七步成章、煮豆燃萁、鶴立雞群、洛陽紙貴、擲地有聲、有意無意、東床坦腹、捫蝨而談、老生常談、絕妙好辭、土木形骸、看殺衛玠、飄如游雲，矯若驚龍、周處自新、頰上三毛、傳神阿堵、捉刀代筆、望梅止渴、一往情深、倒吃甘蔗、肝腸寸斷、書空咄咄、卿卿我我……等，凡此現象都意味著《世說新語》得自於「簡單形式」，也出之以「簡單」形式，後世更從其文學形式中再度獲得了「簡單形式」的奧援。

## 貳、世說新語與簡單形式的對應

### 一、簡單形式的類型

本節擬討論《世說新語》敘事構造體的規模形式及其與簡單形式的對應關係。分析的理論基礎是德國文學批評家安德烈·喬勒斯（André Jolles）於一九三〇年發表的「簡單形式」（Einfache Formen）說<sup>13</sup>。這個理論致力於歸納在人類已創作出來的實際作品下所有文學皆存在著的胚胎結構，即「簡單形式」，這是一種屬於還原性質的研究活動，試圖透過理性思維徹底分析文學的基本構成體。喬勒斯認為「簡單形式」就是以語言形式出現的一種思維結構原則，這種形式的種類數量很少，僅得出九種：傳說、英雄史詩、神話、謎語、諺語、案例、回憶錄、故事和笑話等。

傳說（legend）的形式源自於人類對行為理想的渴望，英雄、聖賢的事蹟傳聞是這個渴望的具體化形式。

<sup>12</sup>以唐宋詩為例，即有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范仲淹、辛棄疾等取其事而用之，元雜劇之「玉鏡臺」、「韓壽偷香」出自〈假譎〉、〈惑溺〉，另八大山人朱耷題畫詩有二十餘首用《世說新語》之典故，清初詩人李鄴嗣有《集世說詩》十九首等。

<sup>13</sup> 同注 8，頁 48-49。

英雄史詩 (saga) 源自於因血緣關係而產生的恩怨情仇等概念與活動，血仇故事、家族歷史、世家譜系，都是這些記憶的存在實體。

神話 (myth)，它經常與英雄史詩、傳說，以及其他簡單形式混合，揭示出事物所以是如此這般的原因，它關注具有永恆意義的事物。

謎語 (riddle)，與前面已考察過的其他形式相比，謎語更多地將注意力指向語言本身、其潛在的語義雙重性，以及其既轉達而又隱藏意義的功能。

諺語 (proverb)，這是一種高度壓縮的經驗形式，經由一個容易記憶的語言公式，如諺語、格言、成語、箴言等，表述或透視人類已往的經驗。

案例 (case)，一個案例就是一個假定性敘事，其目的在於將某個可能人類行動與某套標準和價值聯繫在一起。在一個不俗的案例中，矛盾和衝突錯落有致，使人難以驟下斷存。這個形式是短篇小說的重要先驅和組成部份。

回憶錄 (memoir)，回憶錄足一個源遠流長的形式，它力圖以翔實的具體資料，錄載相典型事件的獨特特徵或一個獨特事件的典型特徵。

故事 (tale)，這是一個古老而通俗的簡單形式，包括世外桃源、境外蓬萊的美好世界，也包括背道而馳的「反故事」 (anti-tale)，描述一個災難邪惡的世界及人類的悲苦生活。

笑話 (joke) 源自於人與世界的缺陷和謬誤，因為笑話頌揚愚行，抨擊蠢事，通過它的嘲弄形式，笑話能夠消解緊張、煩惱。喬勒斯認為笑話為我們提供了非常高於人類特點的一種安慰形式。<sup>14</sup>

以上就是九種簡單形式的要義，喬勒斯謂之為「一個封閉的簡單形式系統」。從數量上來說，只有九種，明顯地稀少；但就能量上而言，它們卻含有蓄勢待發的飽滿位能，以及源源不絕的雄渾動能，既以具體的語言形式呈現出人類普遍共有的思維傾向，更是--切作家據之以組合、改造、形塑的原始語言形式。因此，這套封閉的簡單形式系統被視之為作家進行文學創作時存乎心的思維活動形式，以及應乎手的語言結構實體。喬勒斯渴望「簡單形式」的理論有助於掌握在眩目複雜的文學現象背後或中間所涵蘊的基本結構理式。雖然，這個企圖可能過於遠大，也未必能夠如願達成。但是，「簡單形式」的學說因為具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性，因此半個世紀以來，它一直是活力充沛地穿梭於各種作品的實際分析，此外，它能使龐大繁富的話語現象獲得清晰明瞭的闡述，這也是為數眾多的學者對它作出回應的原因。既然如此，那麼已享壽一千五百年的志人小說經典：《世說新語》，它能否與喬勒斯的「簡單形式」學說進行對話？透過這個視窗望向《世說新語》的結構形態，是否因為角度不同、路徑有別，而能有新的觀點？這是

<sup>14</sup> 同注 8，頁 55-56。又可參拙著：〈世說新語所表現之幽默現象及其意義之探究心美學的觀貼出發〉《國立中興大學文史學報》26，（1996 年）。

斗膽嘗試的原因。至於討論的範圍則從《世說新語》的書寫策略、材料來源、內容屬性和詰言結構等方面依次展開。

## 二、從書寫策略而言

小說是一種由敘事群所組成的構造體。一般通稱敘事的構造體為情節，易言之，情節即是敘事的基本構造物。但是，情節這個構造物還不能算是小說結構中最原始的語言組成形式，原始的語言形式應是由比它更小型的文字構造體所合成的。韋勒克與沃倫在《文學論》中將它們稱之為「構造體的構造體」，並喻之以「原始的」、「初胚的」。他們的見解雖然還未形成如喬勒斯「簡單形式」的系統理論，但值得互相參證。他們表示：<sup>15</sup>

情節（亦即敘事的構造）是由比它更小型的「敘事的構造」所合成的。比它還大而包羅更多的文字構造（例如悲劇、史詩、小說），照歷史地說來，它是由更原始的、初胚的，如同笑料、話柄、軼事以及雜錄等等形式發展而來，而小說或戲劇的情節就是一種構造體的構造體。

由於劉義慶在編撰《世說新語》的方式上，本是掇拾舊聞，近取諸事，因此全書的原始情節構造體，也就如韋勒克、沃倫所揭示的係來自於「更原始的、初胚的，如同笑料、話柄、軼事以及雜錄等等形式」。這些簡單的語言形式就是敘事結構體的母體：所以喻之為初胚，是因為它們只是具體的語言形式，是情節的構成要素，但卻還未發育成形為一部完整的文學作品；喬勒斯認為作家們是經由這些實現了的簡單形式，來進行形形色色、林林總總等文學形式的創作，其中有一些文學形式將組合許多的簡單形式，並在這種組合過程中對它們實施某些相應的改造：因此，多數的文本都在其交學形式中隱含著換位的蹤跡。所以，簡單形式雖然是基本的思維結構原則和普遍的具體語言形式，但是這只意味著來源的共通性，並非忽略在作家蓄意經營下，不同文本所表現出來的差異性。因此，《世說新語》雖和當代的志人小說如裴啓的《語林》、郭澄之的《郭子》,等其有部分相同的簡單形式，如諺語、軼聞、回憶錄、傳說等，但它們仍舊是初胚相同，而形神有異。譬如〈排調〉第24則載：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亦那得坐談？」

而裴啓。《語林》作曰：

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

這兩則的軼事顯然來自於相同的傳說，但是敘事的方法不同，所產生的文本和意趣也就各自不同。劉義慶敘述桓溫在雪天著好勁裝準備出獵，他有意向四體不動的清談家展示自己的武猛有為，所以特別去探視了王導、劉惔諸文士。劉義慶透過劉惔的視角敘述桓溫的衣著是單薄紮緊，便捷利索的打獵服裝，這原本正是桓溫想和寬衣博帶的談家們互別芒頭的--種暴露的暗示，不料圖窮匕現，一眼就被劉惔看穿，劉義慶借由劉惔的

<sup>15</sup> (美) 韋勒克、沃倫 (Rene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 著，王夢鷗、許國衡譯：《文學論——文學研究方法論》（台北：志文出版社，1996年）頁360。

調侃口吻，揶揄自命不凡的桓溫說：「老傢伙，作這一身打扮是要幹什麼？」這樣就使原本神氣十足，威風凜凜的桓溫惱羞成怒，氣急敗壞，所以劉義慶在劉惔的奚落話語之後，再以桓溫不甘示弱的語調發聲：「本人要是不作這一身打扮，你們這幾個還能坐在這裏悠哉遊哉地清談嗎？」因此，《世說新語》對於這個傳說的敘事方式，是建立在桓溫與劉惔——一個極認真在意，一個卻漫不經心的反差對比中，讓兩人的對話形成一種幽默的意趣，所以它被安置在〈排調〉；而劉惔的冷言冷語在這局對話中似乎是略勝一籌的。

同樣的人物軼事，裴啓的敘述方式卻不司於劉義慶。《語林》佈置了對劉惔恭迎長征而還的桓溫，場景較有利於桓溫嘆喑八方的武將性格，通過桓溫的視角，裴啓敘述劉惔的衣著是不涉騎射的交官服裝——「長衣」，又借由桓溫氣焰囂張的傲慢語調散播對文生的歧視與敵意。《語林》最後是以劉惔的反唇相譏作收。因此，對齟的情態是以牙還牙、矛盾衝突的，這與《世說新語》的幽默雋永是大異其趣的。

又，〈儉嗇〉第--則記敘生性檢樸的和嶠與豪闊四海的妻舅王濟，因為對物質消費的態度南轅北轍，以致於發生匪夷所思的「李子事件」。劉義慶和裴啓都選用了這則在當時想必為人津津樂道的話題，它接近於喬勒斯的「案例形式」。案例形式源自於人類對於世界的不同價值判斷，透過一個案例敘事，我們就身臨案例的事件之中，根據不同的標準，對案例的人類行動進行檢驗，或是作為論辯的練習，而其目的在於將某個可能的人類行動與某套標準和價值聯繫在一起<sup>16</sup>。從文學史的視角來看，這個形式有著廣泛的表現領域，諸如在信仰上、審美趣味上、金錢觀念上、愛情與婚姻的態徵度上等等。在「李子事件」中，瀟灑放逸的人將認同王濟的行動與價值觀，謹慎節約的人則同情和嶠的處境。因此，這件軼聞就是《世說新語》和《語林》共同的敘事初胚，情節的構造體，然而，每個作家的創作實踐有別，即使初胚相同，鑲嵌、彩繪、澆釉、火候的參數不同，敘事文本的形態風神也就各顯神通了。裴啓的《語林》以二十三字作了簡單的敘記：

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劉義慶以六十四字作敘述，文曰：

和矯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

《世說新語》添加了能多食李的人物——少年，偷襲果園的時機——和嶠當值，補充了持斧詣園、飽噉李子、送和嶠樹枝、和矯苦笑等動作，並加入一句王濟促狹的問語。劉義慶又運用了較多的關節點和衛星事件，所以更完整且有趣地催化出「伐李事件」的敘事序列。

〈任誕〉第 34 則關於袁耽善賭的事蹟傳說同載於郭澄之的《郭子》，然而話語不同，文本的形貌自然如上述所說的各領風騷，《世說新語》的敘記如下：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恩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慊吝。

<sup>16</sup> 同注 8，頁 53。

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

再看郭澄之的敘記：

桓公樗蒲，失數百斛米，米救於袁耽。耽在艱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即脫其衰，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戲，袁形勢呼桓，擲必盧雉，二人齊叫，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以上兩則敘事一望即知發生於同一軼聞，它接近喬勒斯的「傳說」公式，源自於人類內在對於超凡力量的渴望<sup>17</sup>。以袁耽這樣一個賭王之王的模範，他具體地落實了一種超人的理想，不但天生撫有急人之難、慷慨赴「義」的典型性格，而且賭技出神入化，在頃刻之間神奇地解決了桓溫的燃眉之急。喬勒斯認為在傳說這個形式中，人類使自己的希望和價值具體化起來。因此，可以將袁耽視為搶救貧窮大作戰的超人，而關於他的傳說就是一種簡單形式，以其體的語言結構體現人類身陷絕境時的願望。劉義慶和裴啓有志一同地選取了這個軼聞，但兩人的敘事方式不一，所以呈現出風貌不同的文本。概略而言，兩人在敘事觀點和節奏疏密上的操作不同，劉義慶在文中設計了債主與袁耽一前一後的喊話，債主說：「你想必不會是袁彥道吧？」繼而敘述賭況的激烈，未了，贏家袁彥道說：「你究竟認不認識袁彥道啊？」這樣立場對峙的話語構成了敘事的張力，而兩人意味深長的質詢也生動點染出輸贏起落間的戲劇性變化，《世說新語》以袁耽得意洋洋的言動作收似乎比〈郭子〉以敵家大輸的結果敘述作收要來得活潑有神，在節奏的安排上，郭澄之的敘事從容不迫，安步當車；而劉義慶的敘事則緩急錯落，有疏有密，更具波瀾變化之趣。所以，雖然是來自於相同的渴望、相同的傳聞，但作家在進行創作時，各有獨到的鑲嵌法則，因而造就出各式各樣的文學體貌。

其餘如《世說新語·輕詆》第28則說：「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而《說林》的記載則是：「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又，〈品藻〉第66則卻說：「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以上三則應當都來自於韓康伯的體態特徵傳聞，即韋勒克、沃倫所說的「話柄」。韓康伯為人肥胖，放說其「似肉鴨」，又或者以秦、晉之間的方言「將肘」描述，意謂其人的臂膀甚為粗壯<sup>18</sup>；另外，尚有稱譽他雖然肥胖碩大，看不到骨頭，然而體型龐大壯美，也算有模有樣。

由上述徵舉對勘的幾組敘事文本中得知，不論是韋勒克、沃倫所稱的「笑料、話柄、軼事、雜錄」等小說情節的構成初胚；或是喬勒斯的簡單形式說，它們都表述了小說敘事的構成原理，即這些具體的語言形式是人類思維與語言結構的「功」；然又是小說敘事構造體的「能」：它們在作家實現的文本中，存在著體用之間的差別和互文性的異同。

### 三、 從材料來源而言

關於《世說新語》的編撰方式已知是集腋成裘地廣蒐博采遺聞、軼事、清言、佳話、雜錄、舊文等而成，因而包羅宏富，面向極廣，前人鉤稽索隱，已有成果，王能憲在《世

<sup>17</sup>同注8，頁50-51。

<sup>18</sup>余嘉錫引《方言》曰：「京、奘、將，大也。秦、昏之間，凡人之大謂之奘，或謂之壯、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將，皆古今語也。」同注1，頁846-847。

說新語研究》中有言：<sup>19</sup>

劉義慶編撰《世說》的材料來源，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類是與《世說》同一類型的記載人物言行的軼事小說，如西晉郭頒的《魏晉世語》，東晉裴啟的《語林》郭澄之的《郭子》等。第二類是當時的史書，據葉德輝編《世說新語注引用書目》，劉注中引用有關魏晉的史書大約五十種，如《魏書》、《魏略》、《蜀志》、《吳書》、《晉陽秋》、《續晉陽秋》，以及多種《晉紀》和《晉書》等，這些雖說是劉注所引之書，但其中相當一部分亦當為義慶采錄之書。第三類是當時的雜史，葉德輝引用書目《雜傳部》列有各類人物雜傳等一百二十餘種，如各種《名士傳》、《高士傳》、《逸士傳》、《列女傳》，以及一些名門大族的《別傳》、《家傳》、《世譜》，乃至有關釋道的《高僧傳》、《列仙傳》等等，這些也應當在劉義慶所采錄的範圍之內。

從文獻學的研究所得，不難想像劉義慶的編輯團隊必定足殫精竭慮地網羅原始的情節材料，以便進行《世說新語》的敘事程。就敘事小說的內容源流和形式構成而言，這樣的編撰方式具體地反映出敘事小說的本質與形態，也與現代的敘事理念遙相呼應。韋勒克和沃倫曾將敘事小說區分為「諾否」與「羅曼司」(The romance and the Novel)，他們引黎孚(Clara Reeve)的說明作義界：「諾否是寫出當時風俗與生活之實際圖畫，羅曼司則是用高雅有韻味的語言描寫從來沒有過而且又似不會發生的事情。<sup>20</sup>這個概念與我國小說中以「志人小說」記人間言動：「志怪小說」記鬼神傳奇的分類法雷同：韋勒克、沃倫又進一步析論說：<sup>21</sup>

「諾否」，是現實的，羅曼司則是詩的或史詩的——亦即我們現在所稱為「神話的」。……這兩種型式，有如南北極，顯為散文敘事的兩個血統：「小說」是從非虛構的敘事形式——例如書牘、日記、備忘錄或傳記，年代記或歷史，這一派血統發展下來，亦可說是出自文獻方面：就「文體」言之，它是注重代表性的細節，在其淺近的意義上，它是「表演的」(mimesis)：至於羅曼司，則是古代史詩和中世紀羅曼司的後裔，它可以忽視細節的逼真性，而把它推行至更高的實在，更深的心理表現。

《世說新語》是志人形態的敘事小說，以現實的生活、逼真的言行細節為敘寫的對象，所以~書牘、日記、備忘錄或傳記，年代記或歷史，等文獻，一方面是它的內容母體，一方面也是它的形式母體，假設劉義慶所取資的文獻在某個程度上與劉孝標注文所還原的文獻形影不離，那麼注文引書中的龐大記憶體，既體現了韋勒克、沃倫對於小說文體和其素胚的來源論點，也提供了數百種具體的文獻作為探析喬勒斯「簡單形式」的旁證。如各式山川人物記之於「回憶錄形式」，它們以翔實的具體資料，載錄個人印象中的人物、事件、地理等文化記憶。這類資料十分豐富，從劉孝標注文所涉及的書目就可推知《世說新語》的情節泰半來自於這些源遠流長的「回憶錄形式」，如《豫章舊志》、《廬山記》、《遊山記》(見〈規箴〉第24則)、《文士傳》(見〈言語〉第8則)、《先賢行狀》、《海內先賢傳》(見〈德行〉第5則)、《會稽土地志》、《會稽郡記》(見〈言語〉第91則)、《涼州記》、《西河舊事》(見〈言語〉第94則)、《尋陽記》(見〈棲逸〉第9則)、《尤悔》第10

<sup>19</sup> 同注3，頁45-46。

<sup>20</sup> 同注15，頁358。

<sup>21</sup> 同注15，頁358。

則)、《南徐州記》(見〈捷悟〉第6則)以及《洛陽宮殿簿》(見〈巧藝〉第2則)、〈塔寺記〉(見〈言語〉第39則)等,其餘的各式人物傳記更是不勝枚舉,至少也有百種以上。這些包羅宏富的語言形式經常與傳說形式、英雄史詩形式互相混合組裝。

在文學範疇中,「回憶錄形式」不但握有主導的勢力,而且逐步凌駕於神話、傳說和英雄史詩等形式:尤其是在敘事文學的領域中,「回憶錄形式」更是不可或缺的基礎構造體:這個現象對於《世說新語》這樣的志人類小說而言,其重要性更不在話下。喬勒斯認為「回憶錄形式」的內在思維在於引導人們注意正確性和真實性問題,並以生動具體的細節證實所描述的事件之真實性,這一點也可以說明裴啓的《語林》遭謝安質疑其真實性、正確性之後,身價暴跌的原因<sup>22</sup>;至於青出於藍而甚於藍的《世說新語》身處「回憶錄形式」蔚然風行的特殊時代,既有左右逢源,取用不竭的具體資料,而且「回憶錄興起與昌盛的時期,恰恰是歷史意識形成的時期和作為一種複雜的文學形式的小說崛起的時期。」<sup>23</sup>這樣的文學環境必然刺激劉義慶結合歷史和小說的雙重功能,為他的《世說新語》灌進大量具有歷史意識的交化記憶,而出之以小說形態的敘事方式。以劉孝標注文所提供的晉代史料文學為分析參數,專著即有《晉諸公贊》,與《世說新語》連線61次:《晉百官名》,連線18次:干寶·《晉紀》,連線9次:鄧粲·《晉紀》,連線26次:徐廣·《晉紀》,連線14次:劉謙之·《晉紀》,連線6次:《晉安帝紀》,連線29次:王隱·《晉書》,連線51次:虞預·《晉書》,連線24次:《晉陽秋》、連線110次、連同《晉後略》、《晉世譜》、《晉中興書》、《晉中興人士書》、《晉惠帝起居注》、《晉東宮百官名》等,總計和《世說新語》連線367次之多<sup>24</sup>,這個數據背景說明了《世說新語》的情節初胚源自於韋勒克·沃倫所說的「書牘、日記、備忘錄或傳記,年代記或歷史»:或者用喬勒斯的「回憶錄形式」加以概括,亦無不可,因為,無論是札記、備忘錄、傳記、年代記、史傳、起居注,或是回憶錄,其共同的敘事本質都是「敘事者作為一個證人,把事件結合語言,成為敘述與歷史之間的聯繫的見證橋樑,保證兩者之間的對應與結合。敘事者能夠聯繫敘事與歷史,乃因他是一個既具知識,又誠實的人。」<sup>25</sup>

#### 四、從內容屬性而言

由於回憶錄形式乃是人類歷史意識的體現,它意味著實事求是的思想傾向。喬勒斯認為:「體現在這些發展中的這個思想運動,率先提出了歷史性問題,堅決主張用回憶錄的正確性標準檢驗其他形式,並因此有效地將神話、傳說和英雄史詩從其在人類意識中原先所佔有的中心位置驅趕開來。」<sup>26</sup>因此,在《世說新語》中的思維結構既然偏重於歷史意識,再加上其文體屬於記敘人間言動的志人小說,所以它與「神話」、「故事」等

<sup>22</sup> 《世說新語·輕詆》第24則曰:「庾道季詒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為復飲酒?』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逸。』』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為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

<sup>23</sup> 同註8:頁54。

<sup>24</sup> 據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所附「引書索引」之資料統計而得。同注1。

<sup>25</sup> 參[美]費曼等著(Sheshana Felman`Dorl Laub)、劉裘蒂譯《見證的危機—文學歷史與心理分析》(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

<sup>26</sup> 同註8,頁54。

語言形式的關連就相對地少得多。從劉孝標的注文引書中查訪，與「神話形式」運線的有：《牟子》、《魏略西戎傳》、《浮屠經》（以上見〈文學〉第23則）；《孔氏志怪》（以上見〈方正〉第18則、〈排調〉第19則）；《續晉陽秋》（見〈巧藝〉第7則）；《幽明錄》（見〈傷逝〉第16、19則）；《異苑》（〈任誕〉第50則）；《列仙傳》（見〈輕詆〉第15則）；《靈鬼志謠徵》（見〈忿狷〉第7則）；《魏志·方伎傳》（見〈尤悔〉第1則）等，現舉〈傷逝〉第19則與注文引《幽明錄》之敘記相對照，以辨別《世說新語》和神話形式「維持的對應與區隔關係，〈傷逝〉第19則敘述桓玄臨篡位之際，忽逢心腹羊孚，索元相繼死亡，桓玄內心深覺不安，認為冥冥之中似有天機示警，文曰：

桓玄當篡位，語卞鞠云：「昔羊子道恆禁吾此意。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而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幽明錄》對於索元的死亡另有傳奇的敘記：

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為神所降，來與元相聞，許為治護。元性剛直，以為妖惑，收以付獄，戮之於市中。女臨死曰：「卻後十七日，當今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

這兩則敘事的內容都和索元的死亡有關，《世說新語》是志人小說，劉義慶的情節構成是透過桓玄與卞鞠的對話，流露出他對愛將死亡的疑懼惶惑，他懷疑死亡是某種意義重大但未言明的神諭，而此撲朔迷離的神諭又似乎直接干涉到他即將有所作為的政治事業。

由於喬勒斯認為神話形式具有尊嚴(dignitas)和權威(auctoritas)。它揭示了事物之所以是如此這般的原因<sup>27</sup>。所以，這則敘事的內在思維活動也與神話形式有一定的關連，只是《世說新語》的歷史意識和志人小說的文體屬性，使劉義慶在敘事情節的設計上有所選擇，在〈傷逝〉的文本中，他並未言明索元的死亡乃是上天下降的昭昭神諭，也未提到桓玄篡位後，遭劉裕討伐，兵敗被斬殺於建康的結果，他適可而止地將謎一般的神諭收攝在桓玄那迷惑與憂懼的問語當中。可見在《世說新語》的思維結構和語言形式中，喬勒斯的「神話形式」並非銷聲匿跡地不見蹤影，但卻不是居於核心的主導地位，所以《世說新語》是和「神話形式」維持著一定的距離：這個文學現象恰好與劉義慶的志怪小說《幽明錄》相對，在《幽明錄》中關於索元死亡的情節敘述是：索元不能辨識神諭，誤殺神的使者—某少女，少女臨死之際以斬釘截鐵的口吻預言索元將在十七天之後遭天誅死。索元果不出其預言，如期而死。這位來自於西界的少女前後共帶來兩神諭，第一次是允諾治護索元的疾病，不料索元「誤認」為妖孽竟處以死刑；因此而有第二次的神諭，預言他陽壽已盡，然而索元仍無任何回應，於是神以其尊嚴與權威實現了祂的預言，祂一日不差地終結了索元的性命。從表層而言，少女帶來的神諭與存在於時間之中的具體事件，如索元的死，桓玄的兵敗被斬等發生串連的關係，而從深層的神話意識而言，神話不僅關注具體的，個別的事件，它更著眼於具有永恆意義的問題，例如，人為何會死？少女的冤死、索元的病死、桓玄的誅死：人為何作繭自縛於自以為是的愚昧，無法閱讀天意？劉義慶在《幽明錄》的敘事處理，顯然地是以「神話形式」為意識焦點。從這組例證的對比中可以觀察得知「志人小說」和「志怪小說」在簡單形式的偏重各有

<sup>27</sup> 同注8，頁51-52。

不同的策略和意趣，以《世說新語》的敘事文本和劉孝標的注文引書實況來看，自然是「回憶錄」，以及「回憶錄」與「傳說」，與「英雄史詩」，或與「諺語」、「案例」等其他簡單形式相混合的情節居絕大多數。

## 五、從語言結構而言

桓玄與索元之例，略述「謎語形式」在《世說新語》中的活動脈絡。

喬勒斯認為「謎語形式」中的意識傾向與神話意識密切相關。在關於謎語的故事中，破謎的失敗往往宣示著死亡的後果，猜中了謎語則可獲得生還的保證<sup>28</sup>。由此看來，桓玄不能讀取心腹相繼死亡的天機，意味著他解不開謎底，而解謎失敗就註定了他無法活命，因為他不知道要偃兵息鼓以避開兵敗身亡的後果。是以本則的情節敘述中隱含有「謎語形式」的思維結構。〈術解〉第8則則是解謎成功，逃過一劫的敘事，文曰：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襄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柏樹，截斷如公長，置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稱慶。大將軍云：「吾乃復委罪於樹木。」

然而，謎語在《世說新語》的存在其實偏重於人間的語言遊戲，以〈捷語〉為例，即有曹操嫌新造之相國門過大而題「活」字於其上，為楊脩識破其「門中活」之謎底為「闕」。又敘曹操在奶酪蓋頭上題一「合」字以示眾，楊脩射得答案為「人一口」，眾人方得以享瞰一口奶酪，至於「黃絹幼婦外孫壘白」之合為「絕妙好辭」更是膾炙人口的字謎。喬勒斯在討論「謎語形式」時曾指出：「猜謎活動也使人集中注意出謎人遮擋其知識，以及破謎人清除這層語言遮擋物的能力」又強調：「與前面已考察過的其他形式相比，謎語更多地將注意力指向語言本身、其潛在的語義雙重性，以及其既轉達又隱藏意義的能力。其實，這些論點前賢劉勰已在《文心雕龍·諧[隱]》中於探討謎語的文學結構性時有過闡發，他說：「謎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口文字，或圖像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銜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sup>29</sup>可見，謎語形式不論是在語言結構的特徵上，或是箇中潛存的語言能力競賽傾向，實是人類不分古今東西的一種普遍語言形式。

《世說新語》的「謎語形式」有時是和「笑話形式」結伴而行，三言兩語的文字構造體，體現著遊戲的精神和幽默的心靈：〈簡傲〉第4則的「鳳」字，兼具神鳥與凡鳥二意，出謎者隱匿「凡鳥」之意，猜謎者只認出「神鳥」之意，兩人在意義的雙重反差中分泌出百代莞爾的趣味，這則的敘事文本為：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

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欣，故作「鳳」字，凡鳥也。

根據許慎的《說文解字》：「鳳，神鳥也。鳥，凡聲。」因此「鳳」字就被呂安設計為謎題，由於文字本義和形聲構造的刻意混同，使得鳳字以一個能指兼有兩個所指，而嵇喜被「神鳥」的字義給阻擋於謎底於外，破謎失敗，嵇喜終究無法加入嵇、呂的名士

<sup>28</sup> 同注8，頁52。

<sup>29</sup> (梁)劉勰：《文心雕龍》(台北：明倫出版設，1971年)，頁271。

行列。〈排調〉第 32 則的謎語式笑話結構也是著墨於語言本身的雙重性，此雙重性在於一個所指兼有兩個能指，出題者與破題者遂在文字鬥智上建構妙趣，因此，藥草、謝安、遠志、小草便張冠李戴地輝映成趣：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徵，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謎語形式在話語世界中的普遍性正如神話和笑話一般，它們都存在著思維活動與語法邏輯的特定關係，這個普遍的文學與文化現象，強而有力地支持喬勒斯確信他的簡單形式理論具有現實基礎<sup>30</sup>。

返觀我國的謎語形式也是遍透時空而存在的語言構造實體。除了流傳於民間的通俗謎語形式之外，它還實現於更高層級的交學與語言的創作活動中，因為從廣義的角度來說，文學與語言的構造原理不外是一種借此喻彼的意指方式，尤其是文學中的隱喻，不但有賴於謎語的巧構意匠加以點染、予以披露外，其形式更和謎語那種既在轉達中隱藏，又在隱藏中轉達的性格一致。因此，表現於《世說新語》中的「謎語形式」，絕非僅止於通俗的離合字形、一語雙關的語言形式而已；這些雕蟲小技看在嫺熟於文字系統運作的士人眼裏、不過是牛刀小試的戲作罷了，「謎語形式」在《世說新語》的大宗勝場其實是在高明雋永、隱義以藏用的語言藝術，它們聲東擊西、點到為止，在半透明的語言外衣下撩露意義的胴體，使言外之意呼之欲出而又含蓄不盡，令讚之者在如此的敘事世界中徘徊流連，推想良久。

明人吳瑞徵曾以「雅言」、「捷言」、「形言」、「反言」、「偏言」、「超言」等六種語言形態分析《世說新語》的敘事謀略，其中的「偏言」與「超言」頗近謎語的意識傾向與語言結構，茲徵錄於後，以供參佐。吳瑞徵在《世說新語序》中說：<sup>31</sup>

夫言為意設，情以詞宣，意郁則累牘非駢……情顯則片言可肖。自古著作之匠，提屑玉之斤，秉剪雲之鋸，周疏尋繹，披割蕪穢，語上則遺其下，舉甲則略其乙。凡謂意以不虧為至，言以不盡為工也。故稱年少之見勝，匪至圍棋：語亡國之可悲，不獨一士。思餘而語已止，扣歇而音自長。蓋駢言廣譬，只酬未知，舉端而明，自言中輟，而必欲繁稱文辭，牽裾強聽，則是磬擊而吹竽不斷，水窮而築堰不休。蛇足 徑，取譏往哲矣。是以達人止乎當止，不贅一詞。是謂偏言。……

夫議也者有不明也；辨也者有不見也。同明而言，則繁不如簡；同智而語，則俗不如玄。故大辯若訥，至言去言。長松有風，彰荆產之匪德；清風懷想，著玄度之高標。人見阿恭而識元規非假，我乃生瑗而知靈運當生，是皆簡之又簡，玄之又玄。意相示而枝葉忘，精相通而口耳表，斯言耳之要眇，豈俗事之唾餘，是曰超言。

吳瑞徵所謂的「偏言」，其語言結構特徵是「意以不虧為至，言以不盡為工」；所謂的「超言」，其語言結構特徵是「簡之又簡，玄之又玄。意相示而枝葉忘，精相通而口耳

<sup>30</sup> 同注 8，頁 50。

<sup>31</sup> 同注 3，頁 199-200。

表。」兩者的形式在簡，在少，在玄：兩者的策略在止乎當止，去其當去；在敘述時要「語上則遺其下，舉甲則略其乙。」；雖然這樣的語言形式看來確實有意隱藏或遮蓋其意義的過度暴露或太早彰顯，然而有趣的是：隱藏與遮蓋其實是為了更巧妙有效地暴露和彰顯，如此才能獲致「思餘而語已止，扣歇而音自長」的審美趣味，類若謎語形式在其語義的雙重性之中嬉遊與結盟的性質。另外，能賞清言、雅言、玄言、妙言的，方是我輩中人，不能識得雋言者，非我族類：這是否也意味著士林以某種特殊的語言形式，作為驗明彼我群性的密碼、暗語或是行話？從《世說新語》的語言形式來論，在「謎語」式的思維傾向和文字意匠的滲透下，劉義慶作出了廣泛而多樣的表現，不但創作出與神話意識有關的謎語，與笑話混合的謎語，也創造言盡而意無窮的語言風尚，這種語古風尚是清

微簡遠，居然玄勝」，是「或造微於單詞，或徵巧於隻行」是以虛玄標準，以簡遼為宗」，或是「片言以核理，只詞以狀事，體簡而意淵，語微而旨遠」，是「玄旨高簡，機鋒俊拔，寄無窮之意于片語，包小盡之味于數句。」<sup>32</sup>：這類語言風尚亦是士林辨別流亞的文化密碼，能夠閱讀、理解、襲用這類語言形式的，才是道地名士、瀟灑風流的文化族類，反之或恐非是。

諺語與謎語一樣，是關注於語言自身結構的簡單形式之一。但它與謎語有別，謎語有意猶抱琵琶半遮面，諺語則是納須彌於芥子：前者志在隱藏，後者志在壓縮：隱藏有利於內蘊的發露，因為欲蓋彌彰：壓縮有利於事件的還原，因為四兩足以撥千斤。「諺語形式，將文化詰噫、歷史經驗等巨量材料予以壓縮，使它們成為一個又吋固的密度大而體積小的成語形式，以便在話語世界中作超時空的傳輸，一旦需要還原，只要將它們解除壓縮，再度和相關事件運結，那些被仔細貯存的交化經驗和歷史記憶，就有再次重現，含孕於其中的精神訊息也會重新被喚出。

關於「諺語形式」的界義，喬勒斯認為它是一種高度的經驗形式，植基於對人間事的實際觀察<sup>33</sup>，人類源自於對此經驗的紀錄與傳輸的需求所驅使，因而以提煉和濃縮的方法，將歷史經驗和世間智慧埃入一個容易記憶便於讀取的套語形式以利訴說那些曾經目過耳存心的行為經驗，甚而或可提供目下行動的信鏡。又「諺語形式」包羅甚廣，成語、格言、銘言、箴言、典故、事類等語言實體，均是入幕之賓。

《世說新語》結晶出數十百計的諺語形式，這些被實現了的諺語形式，由於滿足了喬勒斯對於諺語的規範，即「富含歷史意識和人間智慧，並且搭乘著高張力、高密度的形式結構」因此具備著令人嘖嘖稱奇的滲透力，成為後世文人雅士的談資淵藪，甚而是他們文學作品所賴以實現的「簡單形式」。依王能憲的統計，成語和典故之例有：<sup>34</sup>

言為士則，行為世範(〈德行〉1)、難兄難弟(〈德行〉8)、期期艾艾(〈言語〉17)、吳牛喘月(〈言語〉20)、新亭對泣(〈言語〉31)、木猶如此、人何以堪(〈言語〉55)、咫尺玄門(〈言語〉64)、無可無不可(〈言語〉72)、千巖競秀，萬壑爭

<sup>32</sup> 以上俱見宋劉應登《世說新語》序：明王世貞《世說新語補》序、明何良俊《何氏語林言語篇》小序：日本寶曆間僧人竺常《世說新語抄撮》序：日本文化間首原長親《世說音釋》序，轉引自王能憲著《世說新語研究》，頁197-198。同注3。

<sup>33</sup> 同注8，頁53。

<sup>34</sup> 同注3，頁218-219。

流(〈言語〉88)、雲興霞蔚(〈言語〉88)、應接不暇(〈言語〉91)、芝蘭玉樹(〈言語〉92)、蘭摧玉折(〈言語〉96)、竹頭木屑(〈政事〉16)、三語掾(〈文學〉18)、拔新領異(〈文學〉36)、七步賦待(〈文學〉66)、情文相生(〈文學〉72)、有意無意之間(〈文學〉75)、洛陽紙貴(〈文學〉79)、擲地有聲(〈文學〉86)、倚馬可待(〈文學〉96)、東 快婿(〈雅量〉19)、捫虱而談(〈雅量〉22)、秋風鱸魚(〈識鑒〉10)、懸河寫水、注而不竭(〈賞舉〉32)、老生常談(〈規箴〉5)、阿堵物(〈規箴〉9)、絕妙好辭(〈捷悟〉3)、唾壺擊缺(〈素爽〉4)、頭捉刀(〈容止〉1)、鶴立雞群(〈容止〉)11)、土木形骸(〈容止〉13)、看殺衛玠(〈容止〉19)、面如凝脂、眼如點漆(〈容止〉27)……

至於具體嵌入於其他作品的典故亦多，仍據王能憲考索所得為例：<sup>35</sup>

李白詩〈玉壺吟〉「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王敦擊缺唾壺事(〈豪爽〉4)；〈梁園吟〉「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謝安隱居東山事(〈排調〉26)；〈襄陽歌〉「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嵇康美儀容事(〈容止〉5)；〈留別廣陵諸公〉「臨醉謝葛強，山公欲倒鞭」，山簡醉酒事(〈任誕〉19)；杜甫詩〈已上人茅齋〉「空忝許詣輩，難酬支遁詞」，支、許清談事(〈文學〉40)；〈漫成二首〉「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阮籍語王戎事(〈排調〉4)；〈卜居〉「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入小舟」，王子猷雪夜訪戴事(〈任誕〉47)；蘇軾詩〈送劉放倅海陵〉「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掛口，莫今舌在牙齒牢，是中唯可飲醇酒」，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事(〈德行〉15)；〈于潛僧綠筠軒〉「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王子猷好竹事(〈任誕〉46)；〈寶山畫寢〉「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 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周顛與王導諧謔事(〈排調〉18)；黃庭堅詩〈次韻子瞻武昌西山〉「平生四海蘇太史，酒澆不下胸崔嵬」，阮籍以酒澆胸中累塊事(〈任誕〉51)；〈次韻蓋郎中率郭郎中休官二首〉「故人相見青白眼，新貴即今多黑頭」，諸葛恢為「黑頭公」事(〈識鑒〉II)；同詩其二「黃公墟下曾知味，定是逃禪入少林」，王戎過黃公酒壚事(〈傷逝〉2)；辛棄疾詞〈賀新郎〉「翁比渠儂人誰好，是我常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殷浩與桓溫爭競事(〈品藻〉35)；〈水龍吟〉「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來」，張翰(季鷹)秋風鱸魚事(〈識鑒〉10)；同詞「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sup>1</sup>，桓溫北征事(〈言語〉55)……

這些萃取自《世說新語》的成語、典故、事類等的「諺語形式」，除了語言實體本身獨具的壓縮性格有利傳輸、記憶、還原、重組和鑲嵌等優勢條件外，不能忽視語言背後的精神狀態：因為精神狀態的某些需求是導致特殊形式結構出現的動力，當某種具體的語言形式出現時，那些精神需求就獲得了實現。因此，《世說新語》的語言形式之所以普遍地在歷代詩文中流衍增殖，這意味著魏晉風流是如此地被百代詩人們渴求著。

### 參、結語

《世說新語》是一部收納著六百年時間、六百位人物、一千一百三十則的敘事小說，編輯群面對如此龐大的故事體積，如果不知結構要領的話，必然窘態百出，然而，它們

<sup>35</sup> 同注3，頁219-220

被妥當地安置於三十六門類之中，一千五百餘年來，一直維持著穩定的立體規模。從外部而言，三十六篇是輪廓顯露的清晰結構；從內部而言，卻又是輪廓模糊的鬆散組織。從個別的軼事敘述來說，人物事件的輪廓勾勒，在主題上是細筆勾描，其餘若非省略，就是只提供模糊的背景，映射出簡單形式的語言實體蹤跡。

「簡單形式」理論的還原研究方法，可以重新檢視《世說新語》的構成型態，透過九種範疇的分劃，也可以將一千一百三十則的情節結構賦予一套更為簡明的系統，既上溯其源，亦下探其委；而且，兼顧到表裏體用的各個面向，能深入到人類內在的思想傾向，也能具體實現於外在的形式構造，甚至於作更大跨度的縱橫連結，釐清人類思維與行動的普遍傾向。以「傳說」而言，人類渴望一個有著理想的性格，崇高的操守，即使備受磨難仍不改其色的人物，作為他可以瞻仰、可以忻慕、可以模仿的具體對象，在《世說新語》中，這些希望和價值被具體實現於各類事蹟的翹楚者身上，他們可以有數以百千計的言動楷模，可能是求賢若渴的陳仲舉、冰雪聰明的楊德祖、咳唾珠璣的清談家、大無畏的嵇康、夏侯玄，豪爽恣肆的王敦，恢宏器廣的王導，逍遙放達的竹林七賢……等，他們由於實現了人類內在心靈的某種需求，因而反映於這類語言形式的永續構成，而且，隨著時空背景的流轉，人類的渴望和價值標準亦會發生流變，因此，傳說形式中的人物言動也會隨之變易，而這也體現於《世說新語》中的三十六門類，人物的言動楷模已不再固守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儒家的主流價值，方正、雅量、捷悟、豪爽、容止、棲逸、任誕、簡傲、排調……等行爲也一一躍出。

至於「英雄史詩」則體現著家旅內部之間、外部之間的恩怨情仇，這些形式既是人類內在關於血緣關係的概念與紀聞，也是好事者所津津樂道的英雄話題。以《世說新語》的六百個人物而言，他們分屬於兩王、謝、羊、庾、荀、袁、褚、裴、殷、孔、江、陸、楊、蔡、桓、范、何、陳、孫、衛、賀、郝、傅、顧等二十六族。這些世族之間的恩怨情仇故事，經常體現於「英雄史詩」這類的語言形式上。由於《世說新語》的敘事結構為單一情節獨立成則的體製，所以它的語言表現形式並不是長篇鉅構，其所謂「英雄史詩」的語言實體，足各自分敞的故事點，以事件為單位。如曹氏王室的內部紛爭故事散置於〈文學〉的七步賦詩、〈尤悔〉的毒棗殺弟、〈惑溺〉的甄后事件等。

「神話」與「故事」兩形式，由於不合《世說新語》作為志人小說的屬性，因此並不常見，劉義慶另外的兩部小說：《宣驗記》和《幽明錄》吸收了這類的語言形式。「諺語」、「謎語」、「笑話」皆屬於《世說新語》的勝場，它們不但構成了全書的泰半篇幅，也形塑出獨特的語言韻致，體現了文人雅士的風神。「回憶錄」與「案例」恰巧結合了歷史敘事與小說書寫的兩大範疇。原本同屬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史傳傳統，在魏晉時期逐漸分流，一邊是歷史意識和正統史傳的書寫規模，一邊是假定性的虛構敘事和小說體例的書寫規模，《世說新語》的語言形式有它們的結盟彩態，除了記人問言動是歷史素材外，《世說新語》仍沿襲著史傳文學「某某者，某郡人也」的敘述格式。敘事焦點也維持著史傳文學的旁觀者視角，與故事中的人事保持著客觀敘述者的冷靜距離，在體製規模上，《世說新語》的結構形態也類似於歷史傳記般包羅萬象的宏觀感，但又傾心於經營一則一則個人片斷式的「列傳」，令人想起史傳中對人物事蹟的描繪策略。另一方面，透過《世說

新語》的歷代注文箋校等不少實事求是的覆校結果，揭明全書有違歷史的敘事不少<sup>36</sup>，這個現象說明《世說新語》已著意於文學的敘事設計，此外，各則敘事情節的安排經存在著某種矛盾的情竟佈置，這也是案例形式的文學特徵。

以上不殫愚陋，從結構主義的「簡單形式」理論概括《世說新語》的敘事規模，希望能還原其最初的思維活動傾向和語言形式的構成初胚。如此，或能得出《世說新語》的普遍性結構原則，它可能是所以享壽一千五百餘歲的根本原因之一，因為《世說新語》實現了士人在精神傾向上的需求和對於敘事的依賴。

---

<sup>36</sup> [唐]劉知幾在《史通·外篇·雜說》中云：「近者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期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暇疵，偽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著晉史多取此書，遂采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